

---

---

# 戴良的边缘心态与其遗民化<sup>\*</sup>

陈博涵

**内容提要** 作为元遗民的戴良，其气节与操守受到后人的推崇并加以典型化，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戴良丰富的人物个性。以元明鼎革为背景，考察戴良在逸民、族群、遗民等身份上的多元认同，进一步把握戴良边缘化的心理结构，这对于还原他的人生心态，以及解读其文学思想的丰富性都是有所裨益的。

**关键词** 戴良 出处之义 边缘心态 遗民化

元末明初士人戴良在文坛声誉上不及其同门宋濂，但在气节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一般而言，学界对戴良心态的研究往往将其置于“遗民”行列中，对其操守与学行给予较高评价。戴良的遗民认同确实与他的学行操守有关，但也离不开后人的记忆重塑，尤其是他的子孙后代在年谱修订上所作出的删改。可以说，戴良的遗民认同在后世发展中被典型化了。这种观念潜在地影响了我们对戴良心态的客观解读，也因此遮蔽了许多丰富的个性层面。还原戴良元明之际的人生心态，实际上是对他的时代身份认同做一次深度描写。将其亦此亦彼的边缘化的心理认同呈现出来，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戴良文学创作思想的丰富性。

## 一 戴良的行迹与出处之义

戴良的生平行迹在他的文集辑录过程中已经体现出来。《山居稿》作为文集的开端，记录了他早期的乡居生活，以平淡的审美情趣为主，平凡中流露着不甘于平庸的事功倾向。如《咏怀三首》写元末避乱山中的安居之乐，诗云“入秋多佳日，何以陶我情。园蔬青可摘，新谷亦既升。命室酿美酒，一壶聊复倾。儿女在我侧，亲戚还合并。终觞无杂言，但说岁功成。至乐固如此，是外徒营营。”<sup>①</sup>又作《居田》，以陶诗的口吻表达了对安居生活的满足，诗云“我苗今已长，我耕有余隙。斗酒劳近邻，只鸡礼过客。人生但如是，亦足慰平昔。”<sup>②</sup>随着友人的步入仕途，戴良这种安居的生活状态，被一种人生迟暮而无所作为的忧虑所打破。在送别胡翰、宋濂两位好友入仕之际，戴良表现出一种浓郁的忧愁，诗云“我如雀卑栖，子若雁高翔。高卑既殊势，遇合宁可常。事违已忧栗，形单重周章。归卧一室中，谁知我心伤。”“厚禄不虚授，高才将见收。如何独多念，去去怀百忧。”<sup>③</sup>这里面固然饱含着难分难舍的友情，但那种学问未适于世用的感慨亦存乎其间，其对秋感怀此时不复有以往的达观，

---

<sup>\*</sup>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11 年度重大项目“宋金元文艺思想史”（11JJD750009）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（2012M510337）阶段性成果。

① 戴良《戴良集》卷一《咏怀三首》（其三），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 年版，第 6 页。

② 《戴良集》卷一《居田》，第 8 页。

③ 《戴良集》卷二《送别胡仲子二首》（其二）、《别宋景濂》，第 16—17 页。

诗云“岂无一日好，不久还当衰。览物惜年迈，抚景伤志违。日暮坐空堂，此怀当告谁。”<sup>①</sup>后来戴良应元太尉之荐，接受儒学提举之职出仕吴中，亦与这种心态有关。

《吴游稿》是戴良留居吴门时所作，与其出仕的行踪紧密相关。这一阶段，戴良经历了元末明初的朝代鼎革，是其创作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。对于心态而言，需要论及的是他的出处之义。至正十九年（1359），朱元璋命宁越府（今浙江金华）王宗显开郡学，延请儒士叶仪、宋濂为五经师，戴良为学正，吴沉、徐原等为训导，但第二年宋濂便与叶琛、章溢、刘基等人被召至南京。不久戴良亦被朝廷推荐为淮南、江北等地的儒学提举，奔赴吴中。在人生选择上，戴良不同于他的好友宋濂，这与其对出处大义的认识有关。从表面上看，宋、戴二人离开婺州接受重要官职，都是为了实现更大的人生抱负，但戴良对宋濂的出仕却抱有一种深沉的忧虑，他在《寄宋景濂》诗中说“自知羽翮短，不与同奋飞。寄声奋飞者，当慎子所之。烟波渺无从，云路迥难依。云路多鹰隼，烟波有虞机。”<sup>②</sup>戴良强调“慎”字，是有所考虑的。除了应对战乱中变化无常的人事遭际之外，如何恰当地选择进退之路，也是需要去深思的。他在《送河南生》诗中说“将军急筹策，英杰方未闲。苟能慎所择，何忧行路难。”<sup>③</sup>的确，元末盗贼蜂起的社会现实，给元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，平乱靖难以复现太平盛世，无疑成为此时大多数士人的理想。戴良的《平饶信诗》、《迈里古思公平寇记》，以及顾瑛的《安别驾杀贼纪实歌》、杨维桢的《江西饶歌二首》等，都表明在士人心中还保留着对朝廷强大军事实力的信任与期待。因此，出仕朝廷的责任便在于平定叛乱，而不是助纣为虐。戴良在《送丁郎中赴京师诗序》中对时局的判断与对士人的期待表现出他的出处之义，这一态度也决定了戴良对元朝的忠贞立场。他说“上以四方失宁，尝更用方面大臣，锐意天下事。……是时大江之西已为寇巢，而武昌、湖南诸处亦皆沦没寇党。”“余惟士大夫之出处，贵乎知所轻重而已。我国家混一以来，分布爪牙之士干城于内外，星列棋置，联络相承，其为长顾却虑，可谓至矣。迨者一旦寇兵窃发，往往望风而遁，听其陷没。甚者举城以降，缓急无一可赖者何哉？由其不知轻重故耳。”<sup>④</sup>诚然，士人对元初军事统治的威风犹抱有记忆，而经过近百年的发展，蒙古人的凶悍与强大早已在坐享中原王朝的优待中散失殆尽。加上他们连年不断的内部纷争，元末的政治统治是不能与早期同日而语的。戴良所强调的“知所轻重”，是以国家社稷为重、个人生命为轻的立场。他赞赏丁郎中的出处之义，正是看到了士人的这样一种气节。隐居三十年而出仕平乱的朱德润，以及杨维桢《送张先生赴河南幕府序》所记载的张先生，都可视为“知所轻重”的士人。由此可知，戴良对宋濂所说的“当慎子所之”亦包含着对他维护元廷统治的期待。对于戴良而言，宋濂的出处颇带有激进的色彩。

元末朝廷已经不能操控全国的局势，政局的发展多受制于地方势力的此消彼长，方面大臣也各自为计相保守，如浙东有石抹宜孙，总制处州，而绍兴则有院判迈里古思。地方反元势力如方国珍、张士诚、陈友谅、朱元璋亦在相互征伐中逐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。至戴良以王事北上，始发吴门时，全国局势已基本定于朱元璋之手。在北上的过程中，戴良的心情显得非常苦闷，如《泛海》一诗便借北上行程的艰险表达了对世运无常的感伤，诗云“我行无休隙，此去何渺茫。东海蹈仲连，西溟遁伯阳。轻名冀道胜，重己企时康。孰谓情可陈，旅念坐自伤。”<sup>⑤</sup>又如《至昌乐》一诗以丧家狗之喻写出此去所见现实的悲惨，以及道之不行的慨叹，诗云“我行日已远，我力日已倦。亨衢冀栖息，异事骇闻见。如何命不淑，所至时辄乱。既同丧家狗，亦类焚巢燕。仆御心尽灰，妻孥泪如霰。我道苟如此，

① 《戴良集》卷二《立秋日言怀》，第16页。

② 《戴良集》卷一《寄宋景濂三首》（其二），第7页。

③ 《戴良集》卷二《送河南生》，第14页。

④ 《戴良集》卷一二《送丁郎中赴京师诗序》，第134页。

⑤ 《戴良集》卷九《泛海》，第99页。

安得发不变。”<sup>①</sup>在此期间，戴良回忆了迈里古思的事迹，并在创作层面上认同了变风变雅的取向，这也是战乱带给他的观念转变。西夏人迈里古思是在镇压苗军过程中树立威名的，至正十七年（1357），他与石抹宜孙一起平定了处州山贼对婺州的焚掠。戴良奋笔疾书，以极大的热情记载了这一事件。后迈里古思授行枢密院判官，镇守绍兴，对当时纷乱的东南政局起到了保障作用。戴良回忆说“十数年前，海内兵起，生民涂炭。枢密院判官迈里古思公，首率义从分镇越江上，守要害以御暴，立保障以生聚，东南之民赖以休息者久之。方是时，士大夫咸声随影附，争游其门以自效。”<sup>②</sup>至正十八年，在与方国珍的斗争中，迈里古思遭受御史大夫拜住哥的谋害而身首异处<sup>③</sup>。戴良在《迈院判哀诗序》中感慨地说“余惟秦有奄息、仲行、鍼虎者，皆国之良也。一旦以无罪而见杀，国人为赋《黄鸟》之诗以哀之。而紫阳朱子以为世之读是诗者，亦徒闵三良之不幸，而念秦之衰。至于王政不纲，诸侯擅命，而杀人不忌如此，则莫知其为非也。然则公等之死，较诸三良之见杀，固不能以尽同。而诸君之所以哀之者，则视《黄鸟》之诗为无间矣。”<sup>④</sup>这种创作上的比附符合戴良自身的价值立场，同时也代表着那些忠于朝廷的士人在诗歌创作中所持有的认同感，从而复现了音与政通的文学观念。正如元末蒋易所指出“壬辰以来，寇盗荐至，士大夫流离颠沛，小民荡析离居，哀怨之音呻吟载路，戚戚乎，恤恤乎，湫乎悠乎，闻之者蹙额，见之者堕泪，变风变雅于是乎作矣。”<sup>⑤</sup>

## 二 戴良的边缘心态与认同危机

继《吴游稿》之后，是《鄞游稿》与《越游稿》。这两部文稿是戴良隐居鄞越期间所作，反映了入明以来戴良的复杂心绪。我将这种心绪名之为“边缘心态”，它以元明鼎革为契机，以多元的身份认同为内涵。

至正二十七年（1367），戴良自山东渡海，南还至浙东，是年张氏政权溃散，次年元亡。历史巨变就在转眼之间。于戴良而言，他对这一天的到来似乎并没有感到多么大的惊愕，其诗《门有车马客》通过记述问讯故乡消息，感慨世运变迁的经历，写出了他的一种坦然。诗云“天运无穷，人事有崇替。彼道苟如斯，此生安足恃。已矣勿复言，兴衰自古然。”又《西门行》诗云“叹人生，感盛衰，寿命百年焉可期。燕东逝，雁南归，今日不乐待何时。……唱歌曲，挥舞衣，放情舒意解忧悲。”<sup>⑥</sup>以国家社稷为重的戴良真有这样一种人事上的达观，还是说这仅仅是诗文创作的一个托辞？我们可以从戴良入明后的心态来理解这一点。

戴良隐居鄞越，是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出现的，这表示他不愿再过问政事，希望隐居以求志。《萍居解》以问对的方式委婉表达了戴良后期不慕名利、安贫乐道的生活状态，其言“生独不见夫萍之乐也。不根以据，不土以著，或依沼沚，或傍溪壑。凭风聚散，挟雨栖泊，就必其深，避必其涸。逐凫鹭而上下，结萑蒲以隐约，类飞蓬之跌宕，肖浮梗之落魄。此则萍之所甚乐，而余之所托焉者也。”又说“盖德薄而禄厚者，志必亏；才小而福大者，身必危。与其冒甲第而戮辱，孰若药其房而荷其屋；与其侈朱楼而祸殃，孰若茅其庐而草其堂。吾非不知宫居之为贵、室处之为福也，顾德有不及、才有不足尔，吾舍萍居何以哉？”<sup>⑦</sup>知才德不及，不以冒进，是知天命如此，当委顺天命，这在古人看

① 《戴良集》卷九《至昌乐》，第100页。

② 《戴良集》卷一三《送董郎中序》，第142页。

③ 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卷一〇，中华书局2004年版，第124—126页。

④ 《戴良集》卷一三《迈院判哀诗序》，第148页。

⑤ 蒋易《徐长卿望乡诗序》，载李修生主编《全元文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48册，第132页。

⑥ 《戴良集》卷一五《门有车马客》、《西门行》，第161、165页。

⑦ 《戴良集》卷二六《萍居解》，第298页。

来是一种大智慧，非一般人可以参透。而不慕名利，淡泊自守，又有颜回之乐的情怀。萍居而能体会此种乐趣，是宋元以来理学家所强调的心不为外物所累的境界。在这里，曾接受金华之学的戴良，在心理上可谓找到了接受世运变迁的慰藉，萍居者比人事上的旁观者更能体现出戴良此时的心情。由此可知，戴良的确具有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，而且这种态度是以对古人的认同为基础的。张士谔在《戴良像赞》中说“世之人皆以穷达为得丧，而不知其特立独行，契古人之高风。”<sup>①</sup>戴良在这一时期创作了大量的“和陶诗”，也在另一层面上展现了他的志意所在。其《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》以穷为达，在人事变迁中反观内省，宠辱皆忘，确立了自我的逸民认同。诗云“富贵真有命，利达亦有时。时命未至谁为留，岁云莫矣今何之。古人不可见，来哲亦难期。逐猿鹤以长往，俯陇亩而耘耔。歌接舆之古调，和渊明之新诗。为一世之逸民，委运待尽盖无疑。”又《和陶渊明杂诗十一首》其一：“大钧播万类，飘忽如风尘。为物在世中，倏焉成我身。弟兄与妻子，于前定何亲。生同屋室处，死与丘山邻。彼苍无私力，宵尽已复晨。独有路旁堠，长阅往来人。”<sup>②</sup>在古人的思想中，谈及天命者不在少数。“命”在他们看来是由天而定，所谓“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，气以成形，而理亦赋焉，犹命令也”<sup>③</sup>。许衡认为“贫贱、富贵、死生、修短、祸福稟于气，皆本乎天也，是一定之分，不可求也。其中有正命，有非正命者。尽其道而不立乎岩墙之下，修身以待之。然此亦有吉凶、祸福、死生、修短，来当以顺受。”<sup>④</sup>面对人生的遭际，有些事需要自己去担当，即处之以“义”，有些事非人力所能及，则需要处之以“命”。戴良在“命”与历史的选择中，遵循了知“义命”之所在的人生信念。他的“和陶诗”尽管有多种主题，但这种委顺天命的萍居者心态还是无法抹去的，如“何当乘物化，无喜亦无惧”，“从今弃诸事，尽付悟真篇”，“举世嘲我拙，我自安长穷”，“万物皆有时，泰至否自倾”，“于心苟不愧，穷达一任之”<sup>⑤</sup>。在这一层面上，戴良的身份认同自觉地将自己划为隐居以求志的逸民群体。

尽管如此，读戴良的诗歌，还能感觉到其中有一种让他魂牵梦绕的乡土思念，尤其是对妻子儿女的眷顾。他对自己“客人”身份的体认折射出他固有的族群认同，这使他的逸民情结不得不徘徊在边缘地带。在戴良的乡土思念中，时节的变迁最能够触动人心，如：

驱驰三十载，身世竟何如。人老忧虞里，交疏病废余。乡邦书未返，湖海岁将除。后夜烧灯坐，依然叹索居。

眇眇家何在，悠悠岁又阑。十年东海上，千里北风寒。衰鬓随年改，愁怀借酒宽。何乡为乐土，身世各艰难。

野色苍凉日自斜，海城故故隐悲笳。人间已退三庚暑，天上谁乘八月槎。俯首风尘秋有泪，侧身天地老无家。杖藜独立清溪上，愁对归鸿没暮霞。

独对栏干首蓓盘，入秋两鬓转斑斑。长途自觉衰难任，故国谁令老未还。犹喜病妻安久困，只怜弱子历多艰。有书若报征徭事，又遣新愁损旧颜。<sup>⑥</sup>

以上诸诗所写的时节以“岁末”与“秋日”为主。按诗歌触物感兴的创作肌理来说，物色变化无疑是牵动诗人心情的主要媒介。戴良对时节变迁的敏感既证明了他的诗人气质，也流露出他孤独的人生遭

① 《戴良集》卷三〇张士谔《九灵先生画像赞》，第338页。

② 《戴良集》卷二四《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》、《和陶渊明杂诗十一首》（其一），第271—272页。

③ 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中华书局2012年版，第17页。

④ 许衡《许衡集》卷一《语录上》，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2页。

⑤ 《戴良集》卷二四《和陶渊明杂诗十一首》（其五、其九），《和陶渊明拟古九首》（其二），《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》（其七、其十二），第272—276页。

⑥ 《戴良集》卷一七《岁暮感怀四首》（其一）、《辛亥除夕三首》（其一）、《秋兴五首》（其一），卷二五《秋日书怀》，第191—193、281页。

际。隐居以求志并非易事，只要记忆还没有忘却世俗情怀，所谓“逸”就难以实现。岁末时节有两层含义，一是人生迟暮之感难以释怀，如“人老忧虞里”，“衰鬓随年改”；一是常年作客，在新年之际对乡土有一种浓郁的思念，如“眇眇家何在”，“依然叹索居”。秋日感怀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吟咏不衰的主题，在戴良的诗中，秋天的萧瑟与肃杀隐喻着身世的孤独与寂寞。而“老无家”与“老未还”，这种年衰的客人身份，正是他抒情写怀的直接动力。在乡土思念中，亲人子女显然占据了重要位置。戴良的书信往来以及对家庭事务的忧虑，都证明他还是一个平凡的有着家庭顾念的人，而非高尚其事的逸民。其《客中写怀》所写人群涉及妻子、儿女、兄妹、子侄乃至朋友，在这个圈子里，戴良找到了族群的认同。《忆子》一诗围绕着家乡的两颗松树展开联想，以“诗从对面来”的技法生动描写了子女对“我”的思念，从而产生情感叠加的效果。诗云“大儿逾弱冠，有姊同已长。想当望我时，齐行松树傍。见树不见父，呜咽泪成行。小女年尚稚，与弟走踉跄。相呼戏树下，何处褰父裳。”再如《旅怀》想象大儿子独自等候郊外，为自己送衣的场景，诗云“春半家书预作期，长儿十月送寒衣。江空野旷无消息，踏遍苍苔又独归。”<sup>①</sup>虽然送衣场景是戴良设想的，但其情感表达却是双重的，这种描写进一步加深了戴良的心理认同，是其诗歌中较为感人的部分。

这里实际上还有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，既然戴良对家庭有着如此的怀恋，为何不在天下初定之际返回故里与家人团聚呢？又为何甘愿承受这种思念之苦？这就要涉及他入明后的身份问题，即作为元遗民的戴良在明初的人生境遇。

遗民认同与元明鼎革有关，是一个具有政治色彩的身份认同。在戴良的乡土思念中还隐喻着另外一个层面，即以乡土喻指故国，借思乡表达亡国之恨。如《鸿雁生塞北行》：“鸿雁何从来，千里度江湖。当春既北飞，涉秋复南翔。南翔违霜雪，北飞逃畏阳。岂不念乡塞，所至有炎凉。客子别家久，遥遥征路长。朝游齐鲁国，暮行吴越乡。何思拔泰茅，惟忧系否桑。壮心移岁华，但貌委年霜。蓬落绕本茎，莲飘恋旧房。此邦虽乐土，故乡焉可忘。”<sup>②</sup>诗中的比兴意味是非常浓厚的，鸿雁既生塞北，首句如何说不知从何而来？这种借问以自然生灵的无所归宿，隐喻着元亡后自我的认同危机。“鸿雁”对应的是“客子”，实际上就是戴良自己。“朝游齐鲁国，暮行吴越乡”，这一北一南的行踪恰恰是其渡海北上而后南返的过程，这个过程在鸿雁的比兴中就是“北飞”与“南翔”。诗的最后一层意思表达了戴良希望落叶归根的乡土思念，以鸿雁而言，就是希望回归塞北。尾句“此邦虽乐土，故乡焉可忘”，顺延了这一意味，流露出来的正是对元亡的追恨。在《岁暮偶题》中，他表明自己是被遗弃的黎民，诗云“乾纲遭久紊，坤轴值旋倾。朋旧千家泪，妻孥两地情。风尘齐国往，雨雪海邦行。纪晋惭陶令，依刘误许衡。世偏欺逆旅，天亦薄遗氓。陋巷栖颜阖，穷途哭步兵。……弧矢乖前志，干戈送此生。”<sup>③</sup>最能体现戴良遗民认同的莫过于他的自赞，这也是后人用来追加历史记忆的文献所在。在《九灵自赞》中，戴良将自己与扬雄、沈约做对比，认为虽然在学问辞章上不如二人，但在气节上还是能够与他们相颉颃的。他说“若乃处荣辱而不二，齐出处于一致；歌《黍离》、《麦秀》之音，咏剩水残山之句。则于二子，盖庶几乎无愧。”<sup>④</sup>

戴良的隐居非遗世独立，在他的交往圈子里，实际上还有不少同病相怜的人，丁鹤年便是其中的一位同调者，戴良如此评价其诗“一篇之作，一语之出，皆所以寓夫忧国爱君之心，闵乱思治之意。读之使人感愤激烈，不知涕泗之横流也。”<sup>⑤</sup>与这些人的交往，使戴良加深了固有的遗民认同，如：

① 《戴良集》卷一五《客中写怀六首》（其二），卷一七《旅怀五首》（其二），第173、198页。

② 《戴良集》卷一五《鸿雁生塞北行》，第162页。

③ 《戴良集》卷一七《岁暮偶题二十二韵》，第200页。

④ 《戴良集》卷一八《九灵自赞》，第207页。

⑤ 《戴良集》卷二一《鹤年吟稿序》，第238页。

《寄鹤年》：“衰年避地方蓬转，故国伤心忽《黍离》。”

《怀宋庸庵》：“《麦秀》歌残已白头，逢人犹自说东周。风尘颍洞遗黎老，草木凋伤故国秋。”

《怀滑攫宁》：“道途同是伤心者，只合相从赋《黍离》。”

《怀项彦昌》：“百年谁是知心者，千里同为叹世人。”<sup>①</sup>

这些人堪称戴良的知心朋友，缘于他们有着共同的身份认同，以及他们之间相互唱和的黍离之音。在众多的朋友当中，戴良还有一位知己。明初，他在《投知己书》中向好友坦言了自己的处境<sup>②</sup>。信的内容除了对对方的厚爱表示谢意之外，还谈到了出处的问题。戴良认为自己受质愚钝，心志不明，暗于事几，对那些妄言妄行是不敢有所作为的。面对世俗的流言与诟病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“反躬自省，择夷而履之，望险而避之，一举一动，皆由于正，使之无隙之可乘，无迹之可议，如斯而已耳”。其“和陶诗”也表明了这种心迹，诗云“昔出非好荣，今处非避喧。中行有前训，恐遂堕一偏。”<sup>③</sup>

戴良在信中所言及的“彼之造事以诟我，攘臂以挤我”，“知我信我，乃不为流言之所移，嗟乎！世岂复有如阁下者乎”，是否有所指？此种指向与他入明后的谨慎有何关联？我认为这可能与他北上的行踪有关。按戴良诗文所载，有三点值得深思。其一，戴良的北上是有任务的，他说，“及兹将使命，翩然就行役”，“及以王事航海，自南而北”<sup>④</sup>。从其北上诸诗来看，他的渡海极具紧迫性，并非一般的政治任务，如“我行无休隙”，“舟行五宵旦”<sup>⑤</sup>。其二，按戴良所言，他此行的目的是“归我王相”。他说：“近十数年来，海内多故，兵戈四起，而东南为尤甚。余，南鄙之陋儒，盖久而厌乱，遂挈家泛海，渡黑水、登蓬莱，行万里，以归我王相总兵公。”<sup>⑥</sup>“归我王相”又可以释为“寻仁”，《百猿图记》：“予居东海万山中，厌猴之暴，而慕夫猿之仁也。尝杭巨海抵淄水，登泰山，以望巫峡，溯川陕，将求猿之所在而寓目焉。”又《感怀》：“东路阻山海，北走到临淄。临淄古齐国，淳风亦早衰。……知音苟不存，仗剑起旋归。”<sup>⑦</sup>其三，戴良对北上的行踪有模糊记忆的倾向，按上所言“归我王相”的行程是携带着家眷的，但在北上诸诗中却说“骨肉在远道，亲朋皆异域。”<sup>⑧</sup>又黄宗羲在辨析戴良北上的时间时认为：“《李氏志》明言至正乙巳冬娶李氏，明年六月李氏死。此两年之在吴可知也。乃《台州总管吴来朋志》则又言‘至正乙巳，余由海道抵京师，后一年杭海南还。’何其自相抵牾也。盖杭海在二十六年以后，则为乞师；二十五年以前，则海道通问之使，吴寻常有之。良所以故乱其说耳。”<sup>⑨</sup>“乞师”之说，虽遭到戴殿江等人的反对，但从戴良北上的使命性与行踪的紧迫性来说，这种猜测还是有可能的。

事实上，戴良的使命并没有完成，他在山东过完春节后一直等到秋天才渡海南还<sup>⑩</sup>。南还后，他

① 《戴良集》卷二五《寄鹤年》、《怀宋庸庵》、《怀滑攫宁》、《怀项彦昌》，第282、288页。

② 按年谱所载，戴良洪武元年居鄞，时五十二岁，考《投知己书》所言“五十有余年”、“足迹不出乎吴越”，此文应当是写于入明隐居以后。

③ 《戴良集》卷一〇《投知己书》，卷二四《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》（其五），第118、275页。

④ 《戴良集》卷八《始发吴门》，卷二二《题刘庸道浮海百韵》，第95、250页。

⑤ 《戴良集》卷九《泛海》、《渡黑水洋》，第99页。

⑥ 《戴良集》卷一三《赠蒲察镇抚诗序》，第150页。

⑦ 《戴良集》卷二〇《百猿图记》，卷一五《感怀十九首》（其九），第233、167页。

⑧ 《戴良集》卷九《宿高密》，第100页。

⑨ 《戴良集》附录《戴九灵公年谱》（初印本），第400页。

⑩ 《岁暮留别》与《山东九日》诗写出了他这段时间的行踪，“羁臣”、“窜臣”之喻流露出戴良长期漂泊在外的种种复杂心情。《岁暮留别》：“五十明朝过，何从托此身。不堪垂老日，翻作负羁臣。四海无知己，长途惟见君。明朝分别处，草木为谁春。”（《戴良集》卷九，第105页）《山东九日二首》：“去年南地过重阳，种得篱花一丈长。及到山东询节物，伤心惟见叶飘黄。”“年年此日倍思亲，况在天涯作窜臣。昌乐城中风雨急，几回和泪洒衣巾。”（《戴良集》卷九，第113页）

没有直接回到金华，而是隐居在鄞越一带，有诗云“移家东海上，汨没度危时。草市腥江鲍，民居杂岛夷。衣冠随俗变，姓字畏人知。保己无深计，翻言命可疑。”“豫作全身计，远投东海行。地偏惟养拙，岁久未知名。苔径当湖辟，柴门逐水成。牧童时聚笑，穷老一先生。”<sup>①</sup>诗中涉及他隐居的原因与方式，即保全性命是首要的，其方式是改变姓名、身居异乡以及守拙穷老。戴良的这一举动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他北上行踪的特殊性。特殊任务并没有完成，其目的自然可以由当事人任意解说，但这不能遮掩他人的种种猜想，黄宗羲的“乞师”之说很可能也是当时人对戴良的流言与诟病。因此，戴良的易名隐居与谨慎行事，乃至承受着家人离散的痛苦与作客他乡的孤独，都与他北上的行踪有着诸多的关联。他的谨慎与所表现出来的生命感，促使他走在身份认同的边缘上。他想成为逸民，与同调者共唱黍离之音，但又无法割舍亲情与乡土；他想回到故乡，却又担心世俗的流言会招致灾祸并累及家人。他默默地隐居着，试图以此穷老一生，他又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中度日。入明后的戴良有着过多的思虑，就像一个走在边缘上的人，时刻注视着圈内与圈外的生活，并以此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。

### 三 遗民化与历史记忆的重塑

晚年的戴良曾回到故里与家人团聚，他在自己的轩室中找到了先师留下的轩名题篆以及好友的记赞之文，不免睹物思人，欷歔感慨。他说“及以垂暮之年归视故居，轩虽苟完，而壁间旧刻无复存者。急探行囊，仅得公所书亲迹及四君记文拓本而已。……同时流辈凋落殆尽，独仲舒以前朝故官家食无恙，然亦颓然老矣。”<sup>②</sup>不久戴良被聘至京师，因老病缠身，辞官忤旨，待罪寓舍，后因病情危急遂死于洪武十五年（1383）四月十七日。这是他的学生赵友同的记载，主要参考了戴良次子戴思乐的说法<sup>③</sup>。十四世从孙戴殿江在做《戴九灵公年谱》时，延续了上述说法，但在死因上加入了两种猜测：“四月十七日卒于寓舍，盖自裁也。或曰卒于狱。”<sup>④</sup>他在修订年谱过程中，将二者进行了综合，其言：“以老病固辞，忤旨下狱。以今年四月十七日卒，盖以病出狱而自裁也。”<sup>⑤</sup>戴殿江变更记忆的做法受到了后人的影响，尤其是清以来钱谦益等人对戴良气节的称赞。

戴良的气节受到重视，与其本身的遗民认同有关，丁鹤年评戴良云“挟海怀山谒紫宸，拟将忠孝报君亲。忽从华表闻辽鹤，却抱遗经泣鲁麟。”<sup>⑥</sup>又赵友同说“先生每相与宴集为乐，酒酣赋诗，击节歌咏，闻者以为有黍离麦秀之遗音焉。”<sup>⑦</sup>这种认同在后来被加以强化，钱谦益在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中较早地对戴良的死进行了评价：“忤旨待罪，次年四月卒于寓所，盖自裁也。”<sup>⑧</sup>《明史·文苑传》、《宋元学案》，乃至今人的文学史著作对戴良的评价大多承续钱谦益之说。黄宗羲在考察戴良之死时，还提到了明人刘绩《霏雪录》的记载“有胡僧相九灵，日后当有一难，壬戌冬果死囹圄。”<sup>⑨</sup>认可这一说法的有朱彝尊、鲍廷博、阮元等人。身死囹圄实际上与“自裁说”大同小异，都关乎戴良的操守问题，只不过是成全气节的责任推向了明朝。以上诸种说法，是戴殿江等人修订年谱的主要依据，他们所重构的历史记忆是一个道德完善的戴良，而非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。这种结构性的失忆，在

① 《戴良集》卷一七《岁暮感怀四首》（其二）、《客居三首》（其一），第192页。

② 《戴良集》卷三〇《书天机流动轩卷后》，第346页。

③⑦ 《戴良集》卷三〇《故九灵先生戴公墓志铭》，第341页。

④ 《戴良集》附录《戴九灵公年谱》（初印本），第402页。

⑤⑨ 《戴良集》附录《戴九灵公年谱》（修订本），第409页。

⑥ 《戴良集》附录丁鹤年《奉寄九灵先生四首》（其一），第363页。

⑧ 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甲前集《九灵山人戴良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，上册，第15页。

年谱的修订中还有几处<sup>①</sup>，主要目的是想抹去戴良与张士诚、朱元璋政权的诸种关联，例如辨析至正十九年（1359）朱元璋攻取婺州之后与戴良的遭际，明确指出戴良的出仕缘于私人友情，并声明朱元璋在当时尚未立国，戴良与其无君臣之分。在戴良渡海南还的问题上，修订后的年谱认为是至正二十六年，即九月初北上，九月之尽即南还，如此解释也就遮掩了他与张士诚政权的关系。李军先生指出“如果戴良提前在至正二十六年南还，就可以反证他北上没什么使命。既无使命，当然与张吴政权的关系就可以撇清。”<sup>②</sup>抹去戴良与反元势力的关系，实际上是在重塑历史记忆，戴殿江等人所呈现出来的戴九灵公是他们进行了道德提纯后的、被遗民化的戴良，其间已经遮蔽与忘却了一些丰富的人物个性。

戴良的遗民化在全祖望与顾嗣立的评述中更为突出，全祖望于《九灵先生山房记》中说“九灵以不肯屈身而被系，顾其死不甚明。使其出于自裁，固为元毕命；即令以疾死，亦为元也。九灵之大节，不必果出于自裁，而要可信其为元也。”<sup>③</sup>顾嗣立品评其作品说“叔能自元亡后，故国旧君之思，往往见于篇什。……叔能殆欲终其身有元之遗民者欤！”<sup>④</sup>这些论述固然肯定了戴良人品与文品的突出层面，但并未呈现他身上那种“抱道而夷旷”，“安履其素，廓通其变”<sup>⑤</sup>的个性。戴良心态的发展与变化无法割断与元明之际各种政治势力的牵连，作为完整的个人，他的生命感与道的通达性也许会在某种层面上超越他的气节。戴良边缘化的心理认同更加接近战乱时代士大夫的家国担当。

〔作者简介〕陈博涵，国务院参事室中国国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工作人员。发表过论文《蒙元初期士人的文化认同及其文学观念》等。

（责任编辑 马 昕）

① 李军先生在《戴良集》前言部分对前后两个年谱有较为详细的比较分析，这里主要参考了李先生的见解，详参李军《戴良集·前言》，第9—12页。

② 《戴良集·前言》，第11页。

③ 沈善洪主编《黄宗羲全集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6册，第294页。

④ 顾嗣立《元诗选》二集卷二〇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，第1039页。

⑤ 乌斯道《九灵山房记》、胡翰《九灵先生画像赞》，载《戴良集》附录、卷三〇，第372、338页。